

## 试析明代的日本观\*

时培磊<sup>1</sup>

### 摘要

中国人的日本观是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明代的日本观在其发展过程中独具特色。本文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系统分析明代日本观的时代背景，着重从中日关系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在对影响明人日本观的诸多因素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将明代的日本观分成两个阶段进行探析。明初的日本观由于受到朝贡体系确立的影响，产生了“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的观念，这也是对唐代文人日本观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明代中后期的日本观则受倭寇之患的影响较大，很多作品中都充斥着惨无人道和禽兽化的异类形象。但是也有郑若曾和亲自到过日本考察的郑舜功等人的日本观与众不同，他们能够客观的区分日本和倭寇的关系，持有较为友好的日本观。通过分析明代的日本观及其影响因素，对于理解中国人的日本观大有裨益，同时对于发展中日关系也具有启迪意义。

**关键词：**日本观、明代、中日关系史、倭寇、郑舜功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的两个重要国家。从历史角度看，隋唐时期日本曾经派遣大批的留学生和留学僧到中国学习，使得古代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很多方面都打上了中国的烙印。到了近代，中国又派出了大批的考察使和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特别是借鉴明治维新后走上近代化的成功经验，使中国的近代化过程受到了日本很大的影响。从地缘角度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各自的发展离不开彼此间的交流与互动。可以说，从古至今两国间的交往与相互认识始终没有间断过。在这漫长的时段里，中国人是如何认识和看待近邻日本的呢？这是认识和理解中日关系史的重要问题。中国人的日本观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可以将之大致分为几个大的时期。从后往前来看，二战后中国人的日本观经历了战争记忆期、区分论认识期、现代化导向期、政治影响期、多元趋势期等等几个阶段。晚清至民国的时期，

则经历了由学习先进国家经验期到战争敌对时期的变化过程。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则主要以明代为界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明代以前对于日本的认识主要是通过遣隋使、遣唐使以及来往僧人（如裔然），可以说是一种被动接受的过程。从明代开始出现了重大的转变，萌发了主动了解日本和获取其信息的动机，并付诸于踏上日本国土亲身考查的实际行动，这种趋势一直影响到近现代的中国人。而明代又是古代中日关系史中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两国间围绕倭寇问题进行了频繁的官方往来和交涉，到万历时期则在朝鲜爆发了直接的战争冲突。由于这种特殊历史背景的存在，使得明代的日本观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分析和探究。

### I. 先行研究概述章

中国人的日本观问题是中日关系史中的重要问题,所以学术界对此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初期便有人开始关注明代的日本研究问题,缪凤林的《明人著与日本有关史籍提要》(《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年刊》2期,1929年10月)中围绕《日本考略》、《日本图纂》、《筹海图编》和《经略复国要编》四部史籍进行论述,探讨了其版本内容、史料价值和日本认识等问题。黎光明《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柳诒徵《明代江苏倭寇事略》(《国风半月刊》2卷8期,1933年)等几部专著,重点研究明代的倭寇问题,其中涉及到了明代中日关系史的问题。吴玉年《明代倭寇史籍志目》(《禹贡半月刊》2卷4、6期,1934年)中分别提要性质的介绍了明代多种御倭类史籍。汪向荣多年致力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其著作有《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古代中日关系史话》(北京:时事出版社,1986年)、《古代的中国与日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中世纪的中日关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明史·日本传〉笺证》(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等,其中很多内容都属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拓荒之作,对于后人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在《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一书中,汪向荣根据隋唐以前正史中的日本专传来分析中国人如何看待日本的,分别从东夷之一、地理概念、政制、上层建筑和风俗习惯等四个方面来进行阐述。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从中日两国各自的角度考察相互认识问题,抓住了明代出现日本研究专著的特点,重点以地图和语言为例分析了明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上的深化。武安隆、熊达云《中国人の日本研究史》(東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京:六興出版,1989年)是一部全面向日本人介绍中国从先秦到战后研究日本的情况的专书,其中对于明代研究日本的社会背景和主要代表作品都做了介绍和分析,最后作者还从这些著作中总结了中国人所见之各种日本人观。王勇《中国史のなかの日本像》(東京:農山漁村文化協会,2000年)一书中将中国人的日本观从古至今进行了通说,并且分为隋朝以前朝贡时代的“宝物之岛”、遣隋遣唐使时代的“礼仪之邦”、元明时期的“海贼倭寇”和近代以来的“西学之师”这样四个阶段。另外一些著作中分析了清末的日本观,如孙雪梅《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以直隶省为中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中对于清末赴日考察的直隶官民的日本研究和认识进行了分析,重点介绍了东游所见之日本的教育、实业、司法、行政、社会和民俗等方面的内容。此外还有熊达云《近代中国官民の日本視察》、王宝平《清代中日學術交流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汪婉《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张伟雄《文人外交官の明治日本:中国初代駐日公使団の異文化体験》(東京:柏書房,1999年)等著作中,都涉及了清末中国人的日本观问题。

论文方面,李小林撰有多篇论文涉及明代的日本观问题。其在《明人私撰日本图籍及其对日本的认知》(《求是学刊》,2005年第4期)一文中分析了明人认知日本的背景和途径,并且从记载形式、内容和深度三个方面肯定了明人认知日本取得的进步,同时还总结了其中的不足。李小林在《浅论明朝人认知日本的局限性》(《江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一文中具体从明朝对日本的认知缺乏主观能动性、认知日本的手段和途径上存在一定遗憾、认知日本的内容存在不少缺陷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这种局限性,并且分析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华尊夷卑的理念以及受到本国综合国力强大的影响,明朝统治者往往以天朝上国自居,漠视

外部世界，从而失去了认知日本的热情和热情所导致的结果。此外在《侯继高及其〈日本风土记〉》（《兰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一文中，作者认为《日本风土记》是明朝民间私撰有关日本国情的代表性著作，对日本地理、政治、经济、语言、文学、风俗、人情、爱好等各个方面，都作了系统、详细的介绍，内容非常丰富，是今人研究和了解明朝人认知日本的重要资料。陈建平在《〈日本考〉所见的日本婚葬礼俗——明代中国人的日本观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一文中，主要以《日本考》一书为中心，重点分析了其对日本婚姻礼俗和丧葬礼俗的记载，并且认为此书所体现出来的关于日本民俗、民情等文化史、民俗史方面的认识价值，标志着从古代到近代这一过渡时期的划时代的嬗变，是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陈小法的硕士学位论文《明人郑若曾的日本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12月）中分析了郑若曾的日本研究中体现出的日本观。另外在《从服饰文化谈谈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文献》，2003年第2期）一文中，陈小法认为由于受嘉靖时期倭寇成分复杂性的影响，明代人的日本观主要可以概括为三种，一是“畏恶观”，以身受倭患之害的民众为主，认为日本国就是倭寇国，其国狭小，其民狡诈、残暴；二是“藐视观”，以文人将士等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为主，认为其国小且鄙俗，对堂堂大明反为小日本所患，感到不可思议；三是“辩证观”，以少数对日本具有相当研究的人为主，主要特点是能相对客观地认识到日本国情以及它与倭寇的关系。

海外方面尚有不少研究成果值得关注。台湾的郑樑生在明代中日关系史领域成果颇多，其代表作有：《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2004年）（1-13册）、《明代中日关系研究：以明史日本传所见几个问题为中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明·日關係史の研究》（東京：雄山閣，1985年）、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中日关系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1年）、《明代倭寇史料》（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2005年）（1-7辑）、《明史日本传正补》（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对于明代研究的日本的重要史料，郑樑生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且重点研究了明代的对外政策、明日交通、倭寇和朝鲜之役等几个重要问题。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是极为丰富。中山久四郎的《支那史籍上の日本史》（東京：雄山閣，1929年），主要侧重于从中国史籍出发来研究日本历史，对于明代的几部日本研究史籍进行了专门介绍，并且分析了清朝的日本观和中国人的日本国体观，以及对日本风俗性情的看法。秋山謙藏的《日明關係》（東京：岩波書店，1933年）、《支那人の觀たる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34年）及文章《明代支那人の日本地理研究》（歴史地理第61卷第1号），以中国人史书中绘制的日本地图为中心，探讨了中国人的日本研究问题，并且对于中国人的华夷思想和日本观等问题都有探讨。岩井大慧的《支那史書に現はれたる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35年）主要研究了中国史中所见的日本历史问题。而对中国人日本观问题研究甚勤的则属茨城大学的石原道博，其博士学位论文即以《日明交渉史の新研究》（東京：東京文理科大学文学博士学位論文，1958）为题，此后又加以整理译注中国正史中的日本传。其关于中国古代日本观的论文有：《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觀の端緒的形態—隋代以前の日本觀》（《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1号，1951年3月）、《中国における隣好的日本觀の展開—唐・五代・宋時代の日本觀》（《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2号，1952年3月）、《中国における畏惡的日本觀の形成—元代の日本觀》（《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3号，1953年3月）、《日明交渉の開始と不征国日本の成立—明代の日本觀（一）》（《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纪要》人文科学4号，1954年3月）、《日明通交貿易をめぐる日本觀—明代の日本

觀（二）》（《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紀要》人文科学5号，1955年3月）、《日本刀歌七種—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觀の一面》（《茨城大学文理学部紀要》人文科学，通号11，1960年12月）、《明代日本觀の一側面》（《茨城大学人文学部》文学科論集，通号1，1968年1月）等。石原道博对中国历代的日本观都进行了探讨，其中对于明代的日本观他主要是利用《善邻国宝记》、《明实录》、《皇明祖训》，以及中日两国僧侣文集等史料为依据，并且着重从文化交流、僧侣往来和交通贸易来论述明代的两国交往。对于明代的日本观，石原道博总结为三个主要的特征：一是建立在传统东夷观基础上并在元代形成的憎恶的日本观，由于倭寇和朝鲜事件的发生而促使明代官方的日本研究产生了巨大飞跃；二是日本对待基于传统东夷观基础上的中国人之认识，已经动用了从未有过的实力，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一味的采取和平手段；三是明代的日本观虽然以憎恶和恐怖为主流，但是也存在友好感的一面。此外日本学者对于清末民初的日本观研究成果较多，对于明代的日本观研究具有参考意义。如对中国留学生问题有深刻研究的实藤惠秀曾著有《留东外史及其日本观》（《中国文化月报》12，1936年）、《中国人的日本观》（“中国文化丛书”10《日本文化与中国》，大修馆书店，1968年）等，探讨了中国人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认识问题。山口一郎在《近代中国的对日观》（亚洲经济研究所，1970年）一书中，分阶段分析了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伊东昭雄、小岛晋治等人著的《中国人的日本观100年史》（东京：自由国民社，1974年）一书，介绍了从鸦片战争到1972年的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及日本人的看法和认识。美国学者Allen S. Whiting所著《China eyes Jap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中，结合作者在中国的采访和调查，对二战后中国人的日本观及其成因进行了探究。另外日本学者对黄遵宪、谭嗣同、宋教仁、戴季陶、李大钊、郁达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夫、孙文等一些近代名人的日本观都有专门的研究论文，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通过以上对学术史的回顾和梳理可以发现，关于中国人的日本观特别是近代的日本观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是就明代的日本观研究来说，侧重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较多，而涉及日本观的论述较少，仅有的几篇专门论文中往往侧重具体著作的分析或者是整体观的讨论。但是从明代中日关系的走势来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明人的日本观也分成了不同的认识阶段。特别是对于明代较有代表性的日本研究和观点，目前尚未有人进行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比如对于郑顺功之《日本一鉴》的研究就比较少见。因此本文在充分借鉴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明代的日本观进行新的探讨。

## II. 影响明代日本观的时代背景

明代的日本观是与明代中日关系发展的背景紧密相关的，而两国关系在这段时期又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通过分析这段历史进程，可以为我们更好的认识明代的日本观问题提供直接的时代背景。朱元璋建国之初，即积极谋求与周边国家建立交往关系，日本属于较早被诏谕的国家。朱元璋之所以希望尽快与日本建立官方往来，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发端于朝鲜半岛的倭寇问题在元末已经开始影响中国东南沿海，到明朝初年已经变得愈来愈严重。二是出于朱元璋从传统的中华世界观出发，想要重新建立华夷朝贡秩序的需要。洪武二年（1369）正月朱元璋即遣使以即位诏谕日本、越南等国，然而就在此月，“倭人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sup>2</sup>此年三月朱元璋再遣杨载等人使日，其国书曰：

上帝好生恶不仁者。向者我中国，自赵宋失驭，北夷入而据之，播胡俗以腥膻中土，华风不竞，凡百有心孰不兴愤。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彼倭来寇山东，不

过乘胡元之衰耳。朕本中国之旧家，耻前王之辱，兴师振旅，扫荡胡番，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岁以来，殄绝北夷，以主中国，惟四夷未报。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

3

在这封国书中，朱元璋首先强调了大明政权的合法性，申明自己承接宋朝正统而来，乃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正义之举。既然中华正统已经确立，那么原有的华夷秩序理应重新建立，因此四夷皆应前来臣服朝贡。但是倭兵却在山东等地作乱，所以朱元璋要向日本宣布中华正统已经建立，不应该再像元朝时期那样纵容倭寇侵扰中国。并且严词警告日本，如若承认中华正统就应该来华奉表朝贡，若不承认则应固守本土，制止倭兵来华作乱。如果置若罔闻，那么明朝将要替天行道，征伐日本。朱元璋还向占城、安南等国也诏谕了内容差不多的国书，他们均表示臣服。惟有处于南北朝对峙时期的日本，并没有理会朱元璋的要求。充满威胁之辞的诏书也激怒了日本怀良亲王，不仅斩杀了五名明使，而且囚禁杨载、吴文华三个月后才放回。此后沿海仍然倭警不断。在此情形下，洪武三年（1370）三月朱元璋又派遣莱州府同知赵秩赴日。此番诏书内容和前次基本相同，仍然从华夷之分的大义出发，并且以高丽、占城等国的臣服来劝诱，最后当然还是以大兵压境来威吓。日本怀良亲王接见赵秩，并且援引曾经击退蒙古为例，认为此次明朝可能仍然是假借建交实为攻伐。赵秩则沉着应答：“我大明天子神圣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后。能兵，兵我。”<sup>4</sup>怀良一时气沮，随后便是奉表称臣、献马纳贡，明日间关系开始进入官方往来的发展期。但在此后不久，发生了胡惟庸谋反事件。而林贤为助其谋反向日本

借兵的事情，也在洪武二十年（1387）被揭露。以此为导线，朱元璋深恶痛绝日本，不仅决计断交，而且写入《祖训》列日本为“不庭之国”。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即位以后，立即模仿其父宣谕诸国，并积极谋求恢复与日本的外交关系。而此时已经完成日本南北统一的足利幕府也需要恢复对明贸易以获利。永乐元年（1403）八月朱棣便派遣赵居任等人赴日，当年十月日本立即派出以坚中圭密为首的使团回访。坚中圭密一行不仅携来日本愿意称臣纳贡的国书，而且就此和明朝签订勘合贸易的协定。此后制定“日”字和“本”字勘合各一百道，底簿各二扇，由两方各自保存，待朝贡之时互相勘验，如无勘合则不予承认。<sup>5</sup>通过勘合明廷可以了解来贡的船数、人数和货物数量，是明代控制对外贸易的一种相当严密、周全的制度。<sup>6</sup>从宣德初年至嘉靖初年这段时间之内，日本室町幕府一共派出了十二次遣明船<sup>7</sup>，明日之间一直坚持这种朝贡贸易。

嘉靖二年（1523）发生了一件影响明日关系的重要事件——宁波争贡。<sup>8</sup>此年五月，由日本大内义兴派遣的宗设谦道贸易使团和由细川高国派遣的鸾冈瑞佐贸易使团先后抵达宁波。细川船的副使宋素卿原本为中国人，曾多次行贿市舶太监赖恩以牟取私利。此次来贡故技重施，所以不仅在宴饮时的座次居上，而且还得以先行验发通关。这一行径引起宗设一行的极大愤恨，“与之斗，杀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绍兴城下，素卿窜匿他所免。凶党还宁波，所过焚掠，执指挥袁珪，夺船出海。都指挥刘锦追至海上，战没。”<sup>9</sup>此事给明日关系带来极坏的影响，双方因此停贡长达十七年。并且以此事为契机，倭寇更加肆意作孽海上，东南沿海地区受害日重。当浙江巡抚朱纨被执下狱之后，终于演变成嘉靖中期开始的大倭乱时代。<sup>10</sup>

倭寇问题给明代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明史》中曾描述道：“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间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sup>11</sup>就可以想见倭寇之可恶程度。学

界一般把倭寇分成前后两期。前期倭寇主要是日本籍的海盗，主要包括四国、九州一带的无主武士和浪人。后期倭寇则真倭不多，大部分是中国籍的从倭之人，如以王直、徐海等人为首的海盗集团。前期倭寇为劫掠小麦主要前往华北地区，而后期倭寇为劫掠稻米主要把目标锁定在华南地区，同时劫掠其他各种财物。<sup>12</sup>可以说倭寇给中国沿海各省若山东、江浙、广东等地都造成了巨大损失。<sup>13</sup>明朝针对倭寇问题，采取了剿、抚两手并用的举措，既出现了戚继光、俞大猷这样的抗倭名将，也有严嵩、赵文华等奸臣从中作梗<sup>14</sup>。最后随着明朝改变政策放松海禁，以及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采取扩展海外贸易严禁海贼的政策<sup>15</sup>，十六世纪以来猖獗海上的倭寇慢慢的消失了。

日本由丰臣秀吉完成统一之后，便开始谋求海外扩张，首先发动了侵朝战争。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丰臣秀吉发动二十余万大军直逼朝鲜，在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的率领下，日军一路势如破竹。朝鲜在半壁江山尽被倭掳的情形下始向明朝求援。明神宗于当年六月派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领五千明军抗倭援朝，但初战即遭失利。随后明朝又派出李如松、宋应昌等人，取得了平壤大捷等一些胜利。双方在战事胶着之时，开始进行和谈，最后决定议和。<sup>16</sup>万历二十四年（1596）明朝根据议和的内容，派遣杨方亨、沈惟敬等人前往日本册封。当宣读册封诏书时，丰臣秀吉方知被操纵和谈的小西行长和沈惟敬所骗，遂决定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sup>17</sup>第二年丰臣秀吉派遣十四万大军进攻朝鲜，明朝和日本之间再度发生激战。随后在明日间战战和和的过程中，丰臣秀吉于1598年突然病故，接下来日军全线撤退，历时七年的抗倭援朝战争也随之结束。<sup>18</sup>

此后明日双方之间再无正式往来关系。日本新建立的德川幕府一度对明日贸易往来表示支持。虽然明朝禁止，但是日本积极的欢迎政策，还是使驶往长崎的中国商船逐年增多。1636年日本发布锁国令之后，从明末至清初的中日

### III. 明代的日本观

明代的日本观并非一成不变，由于受明代中日关系发展的影响，可以将明代的日本观分成明初和明代中后期两个不同的阶段。明初的日本观主要体现在官方的文献中，特别是明太祖和明成祖的对日外交观。明代中后期的日本观则受倭寇之乱的影响较大，从官方到民间皆有对日本的想法。下面从这两个发展阶段来解析明代的日本观。

#### 1、明初的日本观

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政权以后，力图重新恢复传统的华夷朝贡秩序，因此向周边国家进行宣谕。而此时以怀良亲王为首的日本政权并不以为然，特别是曾经两次击退征日的元军给了他们很大的信心。但是随后在赵秩等明朝使臣的外交攻势下，日本还是接受了明朝的招谕，并称臣纳贡，双方建立起了官方的朝贡贸易关系。在赵秩宣谕日本的诏书中，体现出明太祖及官方对日本的基本看法，文中称：

……蠢尔倭夷，出没海滨为寇，已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朕疑王使之，故扰我民。今中国奠安，猛将无用武之地，智士无所施其谋，二十年鏖战精锐，饱食终日；投石超距，方将整饬巨舟，致罚于尔邦。俄闻被寇者来归，始知前日之寇，非王之意。乃命有司，暂停造舟之役。呜呼，朕为中国主，此皆天造地设，华夷之分。朕若效前王，恃甲兵之众，谋士之多，远涉江海，以祸远夷安靖之民，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或乃外夷小邦，故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此必神人共怒，天理难容。征讨之师，控弦以待；果能革心顺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呜呼，钦若昊天，王道之常，抚顺伐逆，古今彝宪，王其戒之，以延尔嗣。<sup>19</sup>

显然朱元璋是从华夷之辨的角度出发来处理中日关系,他希望能够恢复传统的朝贡体系,将日本纳入到华夷秩序圈之内。在明太祖眼中,日本不过是东夷之一个小国,自然应该顺从华夷秩序。另外的考虑就是,从元末开始东南沿海已经屡遭倭寇之患,因此需要解决海防问题。从这份诏书中可以看出,朱元璋曾经遣使日本责问倭寇问题,因为久久没有得到回应,所以认为是日本国王在背后支持。后来捕获倭寇,始知此乃个体行为,并非国王指使。所以朱元璋决定恢复两国关系,同时通过日本国王的权力来制止和禁绝倭寇扰华。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明初仍然未将日本和倭寇之国混为一体,不像嘉靖时期倭乱严重之时的那种极端认识。明初对日本的这种认识值得重视,这说明经过元朝和日本的隔绝之后,明太祖时期的对日判断尚属清楚,这也为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足利义满确立其室町幕府的统治权力,并且看到和明政府进行朝贡贸易有利可图之后,便开始奉表朝贡和明朝建立官方往来关系。明太祖派出的赴日使臣带回的情报和日本使臣带来的信息都为明初了解和认识日本提供了帮助,也对明初的日本观具有重要影响。

胡惟庸谋反事件是明初日本观的一个转折点。当时明太祖认为胡惟庸勾结日本,企图制造谋反大逆事件,因此处理胡惟庸诸党的同时,也将日本作为背后支持者对待。这一事件也改变了朱元璋在洪武初期对日本的想法,他决计与日本断绝关系。并且在《皇明祖训》中将日本列为“不征之国”之一,“以日本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这种对日本的认识是建立在朱元璋对整个东亚海域国际关系和历史认识的基础上的,他曾经说道: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地,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

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海外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绝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卿等当记所言,知朕此意。<sup>20</sup>

这段对话是在洪武初期朱元璋对省府台臣的一次谈话中所言。可见他在建立政权初期就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明朝刚刚赶走蒙元统治者,所以他们的主要防卫重点是西北的胡戎之患。而对于东南海外的这些国家,朱元璋没有必要也没有实力去征讨或者防备,因此采取了宣谕的方式来建立外交关系,而对于不愿意纳入朝贡体系的国家他们也只能望洋兴叹。对于日本这样的国家,朱元璋从国家颜面的角度考虑,便选择了从历史教训和现实功用两种推辞来列为不征之国。当胡惟庸谋反事件之后,朱元璋对于日本的想法更是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将其视为支持谋反的敌国,因此断绝再与其发生往来关系。这也就是《皇明祖训》中所宣称的:“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

明成祖朱棣从建文帝手中夺取帝位之后,开始仿照乃父做法宣谕周边之国,力图使各国承认其合法地位。而日本方面在足利义满取得国内绝对统治权力之后,也积极准备参加到中华朝贡的世界体系之内。而在永乐朝的中日关系中较为重要的一件事是朱棣册封日本国山之事,“明年正月,又遣侍郎俞士吉赍玺书褒嘉,赐赉优渥。封其国之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御制碑文,立其上。”<sup>21</sup>而朱棣则亲制文曰:

……惟尔日本国王源道义,上天绥靖,锡以贤智,世守兹土,冠于海东,允为守礼义之国。是故朝聘职贡无阙也,庆谢之礼无阙也。是犹四方之所同也。至其恭敬栗栗如也,信义旦旦如也。畏天事上之意,爱身保国之心,扬善遏恶之念,始终无间。愈至,而犹若未至;愈尽,而犹若未尽。油油如也,源源如也。迩者,对

马、壹歧暨诸小岛，有盗潜伏，时出寇掠。尔源道义能服朕命，咸殄灭之，屹为保障，誓心朝廷。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朕尝稽古唐虞之世，五长迪功，渠搜即叙；成周之隆，鬻微卢濮，率遏乱略；光华简册，传诵至今。以尔源道义方之，是大有光于前哲者。日本王之有源道义，又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朕惟继唐虞之治，举封山之典，特命日本之镇，号为寿安镇国之山。锡以铭诗，勒之贞石，荣示于千万世。

22

从这封国书中可以看出明成祖对于足利义满的满意程度，并且对于日本的位置也给予了足够的肯定。归结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足利义满在禁绝寇盗上极为尽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事上明朝的恭敬态度。当时在九州一带沿海横行的海寇，不仅骚扰人民，而且严重影响到日本与朝鲜和中国的正常交流。由于这些海寇大多受到当地守护大名和领主的庇护，所以幕府也拿他们无可奈何。随着南北朝的统一，足利义满逐渐制服了称霸九州的几个有实力的领主和守护大名之后，他就可以下令进行剿捕海寇的活动。足利义满把在九州一带俘获的海寇首领交给中国作为其奉行招谕的证明，以此来说明其诚意。足利义满的这种行为了赢得了永乐皇帝的极大好感，不仅将所献俘寇交还日本以显示大国风度，而且还大加赏赐。所以当足利义满去世之后，明成祖在祭文中对他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其文称：

……惟王慈惠温淑，聪明特达，持身有礼，处事有义；好善恶恶，始终一心，敬天事上，表里一诚。负弘伟之度，怀卓犖之才；仁厚洽于国人，贤德昭于远迹。自朕御极，倾心归向益虔，职贡之礼，有隆无替。恭承朝命，斯须不稽，竭力殫心，唯恐弗及。是用殄寇盗于海盗，安黎庶于边隅。并海之地，鸡犬得宁，烽警不作，皆王之功也。盖王忠顺之诚，皎若日星，坚若金石；上逼于天地，幽彻于鬼神。自日本有国以来，其士贤明，未有如王盛者矣。……<sup>23</sup>

从中可以看出，明朝政府给了足利义满极高的评价，而这种评价正是对他积极剿寇并且称臣纳贡的一种肯定。明政府认为足利义满聪明特达，处事恭谨，而且对于明朝的态度始终保持一种敬天事上的表里如一的诚心。特别是在对待海盗的问题上，足利义满能够雷厉风行，积极执行殄剿海寇的政策。对于中国沿海倭乱的平息和海防治安的好转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才使明成祖改变了明太祖建国之初时的看法，海寇并非为日本国王所指使，也由此对于日本产生了好感。

由于足利义满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使得明成祖时期的日本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日本观是一种良好的番邦观，不再是狡诈险恶的邪恶国家的形象。而日本在明朝眼中的国家地位也进一步提升，正像在封山诏书中所言的那样，“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这种观念并非此时突然产生，如果追述历史可以发现，在唐代中日关系友好发展之时也有这样的描述。比如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在为日本人晁衡所作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的诗序中就曾这样写道：

海东国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历岁方达，继旧好于行人。滔天无涯，贡方物于天子。同仪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观，不居蛮夷之邸。<sup>24</sup>

从王维的这篇诗序中可以看到日本在唐代文人眼中的形象问题。在他们眼中，日本是一个儒学之邦，并且日本的历法是以中国的历法为依据，服饰也大多效仿汉人，这些与中国相类似。中国在周围民族朝觐时，中国对待日本的待遇也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日本被排列在王侯之前，这是一种特别的礼遇。而在诗序中所提到的“海东之国日本为大”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这种观念影响了中国文人与东亚文人之间的交流。唐代文人在与海外进行文化交

流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一流的诗人都有赠诗给日本人，但是很少赠诗给新罗人。当时的新罗文化发展程度要高于日本文化，并且来华的人数远在日本之上，但是在与唐朝文人的交流上远远落后于日本。或许这跟当时文人“海东之国日本为大”的观念紧密相关，这也对后世文人有着广泛的影响，在后代的诗文中时有同样的观念出现。<sup>25</sup>而在时隔五百余年之后，我们在明朝官方的文献中又看到了相同的话语。明成祖朱棣赐给日本的诏书中提到了“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的概念，这是对日本在东亚国家体系中地位的一种高度评价。明成祖之所以对日本另眼相看，是因为他们朝聘职贡之无阙，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对明朝的一种忠诚态度。正像诏书中所言的那样，“畏天事上之意，爱身保国之心，扬善遏恶之念，始终无间。”明朝在与周边国家的朝贡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种理念是要朝贡国具有事大至上的主义。比如在一向被视作典型朝贡关系的明代中朝关系中，朝鲜对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态是慕华，而具体表现是事大。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奉行朝贡之策；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所以明代中朝关系成为典型的宗藩关系。<sup>26</sup>与此相对应，明朝对于当时日本的评价是“畏天事上”或“敬天事上”，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变相的事大主义的承认。由此也可以看出，明初这段时间的日本观，主要是将日本看成一个忠诚的藩属朝贡国来对待。并且认为日本是遵守礼义之国，不仅恭敬栗栗，信义旦旦，而且具有扬善抑恶的风格。这点也突出的反映在他们对待剿灭海寇的态度上，由此也赢得了明朝的好感，对于明人的日本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 2、倭寇之乱下明人的日本观

明人日本观的转折发生在嘉靖时期，其主要原因是倭寇问题的日益严重。嘉靖二年的宁波争贡事件是嘉靖时期大倭乱时代的开始，当时日本的大内义兴和细川高国各自派出的贸易使团共同到达宁波港，由于宋素卿贿赂市舶太监赖恩而导致两派利益不均，最终引发武装冲突。当时宗设谦道一伙在宁波追杀宋素卿不着，只杀死鸾冈瑞佐之后，便一路出城追杀至绍兴城下。虽然没有从地方官手中得到宋素卿，但却击杀指挥刘锦，并且俘获袁璘，之后夺船下海逃遁。日本贡使的这次争斗，在沿海造成了巨大的烧杀事件，由此也引起了明朝官方的震动，并且使中日之间的朝贡关系停止十几年。由此争贡事件而促使定海知县郑余庆下令薛俊编纂完成《日本考略》一书，此书主要就是针对倭寇问题而作。所以在此书中所体现出来的日本观，也是这个时期在倭寇之乱下明人日本观的具体体现。

在《日本考略》中，薛俊所记关于日本的认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沿袭正史的看法，对于日本的历史沿革、天皇世系、州郡属国、物产风土、制度土俗等方面的记载基本都是传统观点，也可以说是比较陈旧的看法。其中很多内容都是直接摘抄古史资料，所以很多已经不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这是薛俊在日本认识上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就是从现实认识出发，薛俊提出了对于日本、日本人以及倭寇的看法。《日本考略》中对于日本人的认识已经没有了以往史书中的仁慈形象，代之以“狼子野心，剽掠其本性也”<sup>27</sup>的看法。在此书的《评议略》中，薛俊引用《杨文懿公与张主客论倭奴贡献书》中的看法：“倭奴僻在海岛，其俗狙诈而狠贪，自唐以至近代，已常为中国疥癣矣。”<sup>28</sup>可见由于受到倭寇之乱的影响，特别是薛俊曾经亲历宁波争贡事件对百姓所造成的巨大危害，《日本考略》中的日本形象已经变得极其丑恶。薛俊对于日本人的认识已经和对倭寇的认识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他对于倭寇凶悍残忍的认识已经扩大成了对整个日本人

的认识。虽然薛俊撰写《日本考略》多是摘录前史，没有用心向到过日本的中国人和来中国的日本人了解情况，但是据此认为此书“道听途说的成分极大，浮夸失实之处甚多”<sup>29</sup>也不完全正确。如果薛俊真的能够多做一些“道听途说”的工作，那么宁波沿海地区有很多到过日本的商人、水手可以供其咨询，对于日本人的认识绝对不至于如此。实际情况是薛俊并没有做深入的访谈和调查工作，只是凭借自己的所见所闻来构建他眼中的日本人形象。“当时和中国人，尤其是江浙沿海接触最多的日本人，不是经营朝贡贸易或者走私的商人，就是骚扰沿海一带，给中国人民带来苦难的倭寇。当然，这些人不代表日本人，但薛俊所见所闻和接触到的，却就是这批人。”<sup>30</sup>薛俊对于倭寇之害有深切的体会，所以他在书中对于倭寇的形象描述就是由这种客观环境所造成的。只可惜他并没有对倭寇有全面的了解，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倭寇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在日本观上，薛俊对日本的认识和对倭寇的认识没有完全分辨清楚，这是他的局限所在。

随着嘉靖中期以后倭患的严重，明朝开始重视东南沿海的抗倭工作，这时出现了一些抗倭的名将，以及对日本有正确认识的学者。郑若曾是东南抗倭指挥官胡宗宪的幕僚，曾在后者的支持下编纂完成了《筹海图编》一书，在书中，他对于日本的认识比薛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代表了当时一批士大夫和上层人士的日本观。郑若曾在《筹海图编》中对当时的日本国情作了详细的调查和了解，同时对于秦汉以来的中日关系史进行了总结性的研究。此书第二卷为《日本国图》，这是中日关系史上由中国人描绘的较为完整的日本地图。《倭国事略》中，郑若曾对日本的国土风俗、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郑若曾不仅具体记载了当时日本诸侯割据称雄的政治格局，而且对日本的经济状况和市场价格、销售行情等等情况都有较为具体的记载。《筹海图编》另外一个较为重要的贡献在于对当时

的御倭战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记载和总结。郑若曾利用官方的档案、塘报等资料，详细记载了沿海各省抗倭事迹和防御情况，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此书的《寇踪分合始末图谱》中，郑若曾将嘉靖中叶以后骚扰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的来龙去脉记载的极为清楚，并且进一步说明了当时的主要倭寇其实就是中国海盗这个事实。这种记载对于认清当时嘉靖倭患的真相，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对御倭战争经过、倭寇真相进行客观陈述的基础上，郑若曾对于倭患的起因、加强海防的措施以及从根本上防止倭患的产生都有很多精辟的见解。他曾经引用《御海策要》中的话说：“今之海寇，动记数万，皆托言倭人，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者，入而附之耳。”<sup>31</sup>而对于明朝官员唐枢所提出的关于海禁政策的言论，郑若曾加以自己的按语道：“此言海寇之患，其始由于流官严禁海商，其后成于内地奸民负商费本。”<sup>32</sup>在这里郑若曾已经看到了由于明政府的腐败，民不聊生，特别是严行海禁之后，导致了倭患问题的最终发生。同时他还借兵部尚书胡世宁的话来说：“自古盗贼起于民穷，民穷由于赋役之繁重，官吏之贪酷。而官吏贪酷，又其致盗之大本也。”<sup>33</sup>因此可以说，郑若曾所主张的通贡道、开互市的提议无疑是正确的意见。所以中日关系史研究专家汪向荣就曾高度评价此书，认为其重要价值在于“详尽地记录了当时的倭情和明朝朝野在抗倭剿寇方面的主张、意见”<sup>34</sup>。而郑若曾编纂《筹海图编》的重要价值在于，他对日本的认识已经将以前把倭寇和日本捆绑到一起的看法进行了拨正。在当时倭寇问题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很多人士对于日本的认识已经极端扭曲，他们的日本观往往和贪婪狡诈、惨无人道等禽兽化的丑化形象结合到一起。在明代文学作品中，这种将日本的形象予以禽兽化的描写，是基于倭寇惨无人道，仁义全无，给中国东南百姓带来巨大灾难的事实。比如在明代苏州嘉定人王翹所作的《赏火谣》中，作者描写了历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过自己的观察进行了辨正。在他的笔下，日本之国是一个文化之邦，日本人也是爱好劳动，掌握技艺，并且称得上品德高尚的善者形象。可以说郑舜功的这种日本观，代表了当时一种先进的观点和看法，这也和其亲身的日本考察经历紧密相关。而郑若曾通过一些来往中日之间的商人和其他人士得出的日本观，和郑舜功之间颇有几分相近之处。这也说明当时部分明朝人的日本观还是跟当时的大潮不同，以较为正确和和善的眼光来看待日本。

#### IV. 结语

明代中日两国之间经历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发展历程，与此相对应，中国人的日本观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朱元璋建立大明政权以后，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日本自然被视为中华朝贡体系圈中的一部分。虽然因为胡惟庸叛乱事件而造成两国关系一度中断，但是随着明成祖朱棣的即位以及日本足利义满政权的努力，两国关系趋于缓和。这个时期的日本观出现了“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的看法，这是自唐代以来文人眼中“海东之国，日本为大”的日本观的继承和发展。明初的日本观中，对于日本不吝赞美之词，礼义之邦和诚信之国的形象跃然纸上。

当嘉靖倭乱发生以后，两国关系极为紧张，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也被打破。为了御倭防寇，明人开始大量的编纂日本研究史籍。由于受倭寇骚扰之害的影响，在这个时期的日本观中，充满了残忍之国、贪婪狡诈的形象描述。当然也应该看到，这个时期仍有一些头脑清醒的学者诸如郑若曾，以及亲自到过日本考察的郑舜功，他们能够分辨清楚日本和倭寇的区别，主张将二者区别看待。在这些人的日本观中，较多的保留了前代对于日本友好、和善的看法。

通过结合明代中日关系发展的时代背景来考察明人日本观的问题，可以发现，当两国关系和谐发展之时，中国人的日本认识较为理性

史名城和闻名遐迩的枫桥，在倭寇的大火中化为灰烬的景象。在这幅由作者描绘的惨不忍睹的画面中，倭寇纵火焚烧千万房屋和枫桥，烈火冲天几乎照亮了城头，也照出了倭寇惨无人道的狰狞面目。<sup>35</sup>由于倭寇的这种惨无人道的烧杀掠夺，造成了一部分人对于日本的仇视情绪和将日本形象进行丑化的想法。但是像郑若曾这样有比较清醒的日本认识和较为正面的日本观的人士并不多见。

在倭乱影响之下，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就是郑舜功。他曾经受浙江总督杨宜的命令出使日本，归国后完成《日本一鉴》，这也是明代唯一一位亲自到过日本，并且完成著述者。所以相对于其他明代的日本研究者来说，郑舜功的日本观更加符合当时日本的实际情况，意义也更加重要。郑舜功在日本期间，进行了认真的实地调查和研究工作。“馆彼六月，咨其风俗，询其地位，得闻其说，得览其书。”<sup>36</sup>经过实地考察之后，郑舜功和郑若曾一样，也已经清楚的辨明了日本和倭寇的关系。而对于日本和日本人的看法也与明朝国内人士的看法迥异，他在《日本一鉴》中写道：

备按：《汉书》本岛之夷，不淫不妒，俗不窃盗，少诤讼。《隋志》质直有风雅。夫夷之善如此。及按《羸虫录》、《异域志》、《考略》诸书，皆曰倭夷狙诈狼贪，目为寇盗，憎若禽兽。今去古虽云世远，种类不易，何相反之如是哉？自奉宣谕，暑往寒来，履其山川。按其人物，知土产夷身间多毛，肋半腥膻，足皆短小，本性慕义，善与不善，身由地气之感生教，本自师之好恶。至接僧俗知书者，笔谈之间谕以善道，其果慕义，岂非天理所在耶！及按《国书》人物，夷复笔谈，皆昔夷中好人，向入书编，不忘于世。今夫好人愿被文化，图从编续，莫不哀矜，救世观音可为编首，百工诸艺为夷好人，原附录者仍不遗录。我后使人知其善者，可为续编。凡笔谈明其好恶，亦是启劝之道也。<sup>37</sup>

就这段记载来说，郑舜功的日本观中具有对日本的形象较为正面化的倾向。对于当时国内有些书刊中丑化日本形象的记载，郑舜功通

和客观。但是当两国关系交恶之时，往往会对其进行丑化和异类化，而这种日本观的出现本质在于将个人的行为扩大到对整个日本的认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仍有部分认识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们能够从事求是的态度出发，对日本进行实地的考察和细致的研究，从而建立比较客观和实际的日本观。而明代日本观发生变化的转折，是因为倭寇问题的严重，这当然是由部分日本海盗对东南沿海的烧杀抢掠而引起的，由此也破坏了日本在明朝人心目中的形象。通过这种考察，可以发现，对于中国人日本观的研究，应该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走进历史场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才能体察到背后隐藏的深层次问题。中国人日本观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深入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处理中日关系，保持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 注释\*

\* 本研究得到“2009年度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青年研究人员研究资助项目”的资助，特此致谢。

<sup>1</sup> 时培磊（1982-），男，山东日照人，廊坊师范学院历史系教师，爱知大学大学院中国研究科博士后期课程在读。

<sup>2</sup> 《明太祖实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卷38“洪武二年正月乙卯”条、“是月”条，第775页、第781页。

<sup>3</sup> 《明太祖实录》卷39“洪武二年二月辛未”条，第787页。

<sup>4</sup> 【清】张廷玉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卷322《日本传》，第8342页。按：《明实录》中记载了赵秩此行的诏书，但是怀良与其问答之辞却没有记载。赵秩此番应答未必能使怀良心服口服，但后来两国关系的建立确由此始。明人所成之《明实录》不记，却录入清人所修之《明史》，值得进一步探讨。

<sup>5</sup> 【日】牧田諦亮：《策彦入明記の研究》（京都：法蔵館，1955年）上卷“行在礼部为关防事该”，第354-355页。

<sup>6</sup> 参见郑樑生：《再论明代勘合》，收入氏著《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第十卷，第9-36页。

<sup>7</sup> 参见【日】佐久間重男：《日明關係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92年），第154-155页。

<sup>8</sup> 关于宁波争贡事件的详情，可参见汪向荣、汪皓：《中世纪的中日关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217-237页；郑樑生：《宁波事件始末——一五二三》，收入氏著《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3年）第十二卷，第9-70页。

<sup>9</sup>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322《日本》，第8348-8349页。此次事件明代史书多有记载，如《明世宗实录》卷28“嘉靖二年六月庚子朔甲寅”条、《筹海图编》卷2《王官使倭事略》之“嘉靖二年入贡”条，等等。

<sup>10</sup> 参见郑樑生：《明嘉靖间浙江巡抚朱纨执行海禁始末》，收入氏著《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第五卷，第1-34页。

<sup>11</sup>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322《日本》，第8358页。

<sup>12</sup> 参见【日】太田弘毅：《倭寇：商業・軍事史の研究》（横浜：春風社，2002年），第123-156页。

<sup>13</sup> 参见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日】田中健夫著，杨翰球译：《倭寇—海上历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13-115页。

<sup>14</sup> 参见郑樑生：《严嵩与靖倭之役》、《明嘉靖间靖倭督抚之更迭与赵文华之督察军情——一五四七~一五五六》，收入氏著《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第七卷，第37-126页。

- <sup>15</sup> 参见【日】呼子丈太朗：《倭寇史考》（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71年），第309-314页。
- <sup>16</sup> 参见郑樾生：《壬辰倭乱期间的和谈始末》，收入氏著《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第十卷，第37-92页。
- <sup>17</sup> 参见张庆洲：《抗倭援朝战争中的明日和谈内幕》，《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第101-104页。
- <sup>18</sup> 参见郑樾生：《壬辰之役始末》，收入氏著《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第十二卷，第231-242页。
- <sup>19</sup> 《明太祖实录》卷50“洪武三年三月庚寅朔”条，第988页。
- <sup>20</sup> 《明太祖宝训》卷6“洪武四年九月辛未”条，第485-486页。
- <sup>21</sup>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322《日本传》，第8345页。
- <sup>22</sup> 《明太宗实录》卷50“永乐四年正月己酉”条，第752-753页。
- <sup>23</sup> 《善邻国宝记》，转自汪向荣：《〈明史·日本传〉笺证》（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203页。
- <sup>24</sup> 《全唐诗》卷一百二十七。
- <sup>25</sup> 参见张哲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92页。
- <sup>26</sup> 参见孙卫国：《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南开学报》，2002年第4期，第66-72页。
- <sup>27</sup> 【明】薛俊：《日本国考略》，收入【明】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卷103，第2044页。
- <sup>28</sup> 【明】薛俊：《日本国考略》，收入【明】邓士龙辑，许大龄、王天有主点校：《国朝典故》卷103，第2056页。
- <sup>29</sup> 朱莉丽：《倭寇之乱下明朝人对日本的研究》，收入陈尚胜编：《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的思想、制度与政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5页。
- <sup>30</sup> 汪向荣：《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36页。
- <sup>31</sup> 【明】郑若曾撰，李致忠校：《筹海图编》（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71页。
- <sup>32</sup> 【明】郑若曾撰，李致忠校：《筹海图编》，第673页。
- <sup>33</sup> 【明】郑若曾撰，李致忠校：《筹海图编》，第672页。
- <sup>34</sup> 汪向荣：《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第216页。
- <sup>35</sup> 参见张哲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第236-237页。
- <sup>36</sup> 【明】郑舜功：《日本一鉴·绝岛新编》卷1。
- <sup>37</sup> 【明】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2《人物》。